



2005--2006：中国的社会思潮与理论斗争(杨帆)

(2006-2-25 16:16:58)

作者：杨帆

可持续发展，资源约束，克服贫富差距这一方面。

这样做是因为中央精神和社会舆论已经很明确，他们想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和位置，就不能不接受这些观点。问题在于，剽窃别人总是不能长久的。立场不对，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对，做起来总是很别扭。零敲碎打的结果，还是要导致全面的反思。

2006年仍旧不可能是“改革年”，而是“反思改革年”。要经过两三年规划讨论，重订改革思路，等到十七大总方针确定之后，再有计划地推动新的改革开放。

经济学主流派迫于形势假反思，急于继续改革，是代表权力资本集团，企图在加速实质性改革中捞取更大的利益，他们想继续掌握改革主导权。改革的主导权不能继续被权力资本集团及其理论代表控制，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调整，对国内外形势应达成新共识，已形成的利益格局必须调整。目前两年放慢改革开放的速度行反思是必要的，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。

2006年中国落实WTO

市场准入，民族矛盾会更加突出。我们提出新的2006年要反思的题目：国家安全，外资政策，科技发展，信仰重建。我们希望那些“改革设计者”变成反思者，共同反思，但是恐怕他们跟不上形势。

因为我们代表的利益不同。他们代表的是既得利益集团，权力买办资本，我们代表广大人民利益，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。

有的自由主义者提出：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？是企业家和政府的矛盾，他们提出什么“工商文明”，是资本逻辑和西方中心论。我们则认为，主要矛盾是人民和国家利益，与权力的资本化和买办化的矛盾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被权力资本化所扭曲，忽视了公平和安全，已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，爆发许多矛盾冲突，包括民营资本与政府的冲突，

民众利益与资本家的冲突，甚至发生严重的血案，如农民工杀死工头等，环境破坏和煤矿爆炸之类的恶性事件，几乎到了难以遏止的程度。

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青年自由派主要是律师，越来越多地参与民间维权活动。他们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。美国在中东继续战争，在中亚以“民主”为名推行“颜色革命”，

迫使我们国内控制不断加强。这给本来应该通过民主法制轨道合理解决的民众“维权”，增加了复杂的背景。现在左右派在“民主”问题上都没有共识，需要继续研究。

左派对于民主、维权等问题没有共识，在民营资本中间缺乏影响力，是非常大的弱点。我们应该支持民间正当合法的维权活动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制止权力资本恶性膨胀；我们应该警惕各种敌对势力瓦解我们的阴谋，保持国家的稳定；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爱国主义和战略产业等理论，影响民营资本，帮助他们从民营资本上升到民族资本，与国家利益根本上一致起来。

三、反思改革，需要我们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

邓小平南巡克服“极左”以后，对于“极右”也有警惕，他在晚年提出纠正两极分化的重要思想，基本上为自己的改革理论上完满句号。

我们不应该苛求邓小平，实际他在晚年的思想没有得到贯彻，中国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，改革逐步丧失了公平性，开放忽视了国家安全，把这些问题追溯到邓小平理论，既不客观，又不策略。现在我们反思改革开放，在理论上需要妥善处理的，就是要历史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，特别是他的“少数人先富起来”的理

论。

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《邓小平年鉴》，全面记录了邓小平关于贫富问题的论述。他一再讲：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和人富起来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。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，我们就失败了。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，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。总之，一个公有制占主体，一个共同富裕，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。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这些社会主义原则，从长远来说最终目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。小平多次提到以公有制为主体，不搞两极分化。他的判断是：当一部分人很富时，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措施。

他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，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是终生的，坚持社会主义，反对两极分化的观点也是始终如一。

小平在1992年就有所警觉，他说，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时就要突出提出和解决“两极分化”问题。小平1992年对外宾说：“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，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。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收入问题。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差距，但这种差距太小了不行，太大了也不行。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，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。到本世纪末，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。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，又不鼓励打内仗。”

二是1993年对他弟弟说：“国家发展了，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。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？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？这都是大问题。题目已经出来了。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。

分配的问题大得很。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，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。要用各种手段、各种方法、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。中国人能干，但问题也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复杂，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。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。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，少部分人没有，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，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，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。这个问题要解决。过去我们讲先富带动后富，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。现在看来，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。”我们要给邓小平鼓鼓掌。

邓小平的贫富论是完整的，但是在1995年以后没有得到贯彻，既得利益集团歪曲了“让少数人先富起来”的思想，“发展是硬任务”思想，作为扭曲改革的理论武器；

同时他们淡化邓小平的爱国主义，反对霸权主义的思想，因此应进行理论正本清源，不仅一直指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，也应该继续指导我们反思改革开放。我们目前反思改革开放，邓的旗帜不能丢，要注意历史地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思想，不可让瓜分派再利用小平思想，也不可犯90年代初期左派回潮，全面否定小平思想的错误。

四、正确开展理论争论，克服左右倾教条主义

1975—1995年中国思想界可以概括为“自由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”的斗争，自由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的，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，与中央与群众建立了良性互动关系，先否定文化革命思想，后否定计划经济思想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，这就是被称为“新启蒙运动”的思想解放，其主流是健康的，经济学家只是其中一个分支，并不占主导地位。

1，90年代后老左派失势的原因。

90年代初期三年“老左派”回潮，在政治上非常有利的情况下，却始终拿不出什么新的理论。有些人维护国家稳定的立场是坚定的，但头脑比较清醒，不希望搞得太左，比如王小东等人提出民族主义，我则帮助北京青年报进行国情教育，效果很好，但终究不能成为主流。

结果是老左派主导进行“反对和平演变”教育，进一步批邓，否定改革开放，终于惹怒了邓小平，1992年南巡以后，左派迅速失败，这次教训至今无人认真总结。

老左派人物的解释是，当时改革开放的弊病尚未充分暴露，群众没有支持左派，他们否认自己在理论上重大缺陷，他们的理论反思能力实在是太差了。

要知道，现在虽然群众舆论是支持反思改革的，但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也比90年代初期要大的多，特别是吸收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媒体参加。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，比如市场机制基本建立，知识分子职业化，国家机关专业化和科层化，这都是社会基本的体现，也是“中左和中右”思潮的社会基础。

而极右思潮的基础之所以独占主流，实在是因为权力资本化发展太快，腐败势力的蔓延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支持。

决策层指导思想的失误当然是关键的原因。

现在左派的发展，主要是依靠领导层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，才掌握了一定理论资源。

如果以为形势表面好转就拒绝反思自己，那么再次失败就不是悲剧，而是闹剧了。

因为极右所代表的利益集团，并没有受到真正的遏制，其社会基础是极其强大的。

说句悲观的话，我们能作为“非主流”能够尽自己的良心，或者叫做行使这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功能，为弱势群体说句话，已经很不错了，

到现在居然能够自立门户，居然能够有点影响，甚至于居然能够非常有限地影响政策，已是求之不得。想当主流吗？

我们一无这野心，二无这必要。因为我们只在一种条件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